

在第二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热议——

破解AI快速发展中的版权之困

□本报记者 赵新乐

如何进一步阐明版权文化的内涵,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如何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提升版权服务……

12月17日,第二届中国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新址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中外版权历史文化、版权文化学术理论、版权文化的未来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

回望:文化中的版权价值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围绕研讨会“版权文化”的主题,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提到了文化中的版权价值,他认为,版权工作在助力意识形态管理、全面服务人民群众、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传播中国好故事、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文化建设来讲,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失去自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孙宝林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需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来回望过去,展望未来。通过版权史的望远镜,以全球视野和大历史观纵览古今中外,进行比较研究,是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探索构建兼具引领性和适应性的全球版权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名誉主任李明德梳理了两大法系中作品保护制度的演变历程,解读了版权制度与著作权制度间的差异,阐述了中国著作权法律体系背后的逻辑。他认为,洞悉这一内在逻辑及演变,是准确把握并妥善处理当前一系列版权问题的关键,也是对法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要求。

对于如何研究版权文化,王志成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完整准确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依托,加强版权转

果转化,大力促进核心版权产业发展,服务国家经济主战场。以文化繁荣为目的,运用版权制度保护创新、激励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守正创新,运用版权制度优势为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以提升中国版权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影响力为努力方向,讲好中国版权故事,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现状:AI发展的版权之困

“目前,全世界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高质量的训练数据从哪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的这个提问,掀起会场讨论热潮。“所有高质量的数据都是有版权的,比如经典的图书、期刊论文以及影视作品等。”张平说,在内容获取、输入和输出的各个环节,未经授权许可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都存在较大的版权侵权风险。

对于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版权问题,基于目前已有研究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提出了原创性的理论支撑——“共票机制”,其核心在于强调利益分配。他建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治理中,通过共票机制,打破传统所有权模式,不聚焦于数据的所有权归属,而是强调数据共享和赋能,促进数据流动以实现更广泛的利益分配。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认为,寻找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合适的版权治理时点、治理对象和治理方式,让社会在技术变迁的“无知之幕”前始终能够保持对新生技术的包容式接收与理智性选择,是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治理体系的关注重点。他建议通过构建“模型开发—应用部署—内容输出”的综合治理范式来明确各阶段主体的责任。

思考:版权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版权业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新机遇,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助力版权服务及与时俱进的版权立法、执法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创新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陶乾提到,版权服务部门需要关注到,AI正在逐渐成为影视、时装、数字艺术等领域从业人员创作的重要辅助性工具,也需要回应市场主体对于有流通价值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交易需求。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数字内容合成与伪造检测实验室主任曹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她提到,在版权保护中区分机器生成内容和人创作的内容非常关键,相关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和检测文章、照片等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或参与生成。

“现阶段人工智能在法律上只能被视为辅助工具,而非非自然人的合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熊琦的观点是,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版权服务,核心在于如何正确且高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助力创作和传播。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版权服务的核心任务,是围绕确权做好工作。

“展望人工智能在版权交易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它将赋能版权创造、交易与保护等一系列环节。”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林秀芹建议,相关学术研究和产业布局,可以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链和版权创新“双链融合”展开。在人工智能时代,版权的服务范畴也可相应延展。

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银良建议在法律层面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单独创设体系,从版权公共服务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建立相应的专门系统,以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自动登记、许可、检测,处理纠纷等。

探索:构建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对于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与挑战的版权业而言,构建中国版权自主

知识体系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卢海君认为,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性工程。唯有精心打造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涵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版权理论与实践体系,才能使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自信屹立于全球舞台并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提出了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须深耕六大关键领域:加强学科建设,在法学学科框架内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强化理论基础,跟上版权事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注重实践探索,不断探索创新,创造优秀案例,丰富中国特色版权体系;培育版权文化,提升大众对版权的认知和认同;建强版权队伍,着力培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的专业人才;讲好版权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和力量。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认为,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中国实际,服务建成文化强国战略。通过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不仅要在理论上扎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还要在全球视野下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确保版权制度既能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又能促进全社会的文化繁荣与发展。”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袁真富说。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彭焕萍谈道,在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中,深化版权人才的体制机制改革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近年来,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河北省委宣传部在版权人才培养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致力于打造具有版权特色的出版学院,旨在培养更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懂版权且会用版权的复合型人才,为建设版权强国、文化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 时事

中华商务越南公司开业

本报讯 (记者徐平) 12月15日,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的外海子公司中华商务联合印刷(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公司)开业。

越南公司成立于2024年5月,占地6300平方米,是中华商务继印尼生产基地之后又一重要海外布局,作为中华商务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南亚地区客户提供全面印刷解决方案。越南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商业及包装印刷服务,产品类型丰富,包括宣传册、说明书、海报、广告制品、名片以及各类装帧笔记本,支持个性化定制与批量印刷。该公司引进了海德堡印刷机、KBA(德国高宝)印刷机等多国内先进设备,搭配全自动化生产线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提供从设计到成品的一站式服务。

据悉,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是由早年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香港经营的印刷厂合并而成,现为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单位。截至目前,中华商务在香港、深圳、北京、上海等地设有生产基地、全资附属公司,并在海外设有多个子公司、办事处。

《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解剖国人的文化心理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当代著名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晓声撰写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一书近日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总绪和八章,宏观地描述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演变历程的同时,指出这是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积淀过程。

梁晓声认为,中国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文学戏曲、音乐歌曲、绘画书法等,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比如书中写抗战时期的口号,表现了当时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日的精神风貌,关注的是特定时期的文化自觉性;写母亲上扫盲夜校、学习识字课本,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妇女真实的生活状态,她们通过知识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向未来迈出了崭新的步伐。对于每个历史时期,他都从历史背景和时代表现进行了客观描述,从中找出产生的历史必然,同时不断重新审视这种必然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何以产生、何以存在、何以发展是梁晓声始终在思考的问题。”该书责任编辑李漓、张露认为,此书是梁晓声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后,再次深度解剖中国人文化心理基因及演变的力作。

《发现晋东南》探索地方艺术魅力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 《发现晋东南——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地方风格》新书发布座谈会近日在山西博物院举办。本次活动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佳作书局联合主办。

晋东南地区是文物大省山西的宝藏之地。长治拥有7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全国第三位;晋城有72处,居全国第四位。若是论及元代及元之前的古建筑,晋东南的数量更居全国之冠,对研究我国建筑史及美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发现晋东南》一书由林伟正、徐胭脂主编,从“地方风格”视角探讨晋东南遗存艺术。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胡彦威在致辞中谈道,对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研究、讨论加以传播、传承,是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共同的时代使命。三晋出版社推出的《发现晋东南》就是承担这一使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缘起于2023年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的“地区风格的再议:晋东南地区古代视觉文化及物质文化研讨会”,是一部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地方视角的著作。

福州举办侯官文化主题图书巡回展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12月16日,第三届侯官论坛之“侯官文化主题图书巡回展”在福州举办。该主题图书展同步在福建理工大学及大梦书局巡回展出。

侯官文化得名于闽都旧称“侯官”,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侯官自古以来文化积淀丰厚,文教发达,科第繁茂,古代侯官名人辈出,从北宋国学先驱“海滨四先生”,到南宋朱熹集大成,明清更有多位英雄伟将。至晚清时期,在福建地域文化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的“侯官文化”,是福建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晚清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现场书籍种类涵盖了历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图书展览,旨在让侯官文化以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吸引大家进一步去关注千年侯官传统文化价值。



濠江记忆 纸短情长

“廿五濠江情 携手谱新篇——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主题文献推荐展”近日在深圳图书馆中心馆二楼开展。展览选取报纸版面、图书来讲述澳门故事,呈现澳门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

展览分为“回归历程”“融合发展”“活力湾区”“今日澳门”四大专题。策展团队从深圳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中检索、翻阅了报纸、图书等多种文献,从文献中挖掘澳门事件、澳门元素,最终精选出200余种专题图书和87个特色报纸版面。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

图为策展方设计的主视觉海报。
本报记者 徐平 文
深圳图书馆 供图

■ 产业论语

让典籍与公众产生更好的精神融合

□韩浩月

启定于2003年的北京大学《儒藏》项目——这一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重大学术文化出版工程,凝聚了中韩日越四国500位学者的心血。《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在2022年5月已全部出版。近日,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捐赠2500万元,用于支持北大《儒藏》数字化项目,相关成果在“识典古籍”上线后,将实现人人可以使用《儒藏》的目标。

关于《儒藏》,季羡林先生曾用生动的语言解读它的编纂价值,“《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他所说的“面子”,其实就是文化形象,而他所说的“交代”,指的则是这一代学者的责任,在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的推动下,《儒藏》的编纂,很容易使人想到《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资治通鉴》的出炉过程,一部典籍背后的人影绰绰,往往藏着编纂者宏大的文化理想,他们为之付出的智慧与辛劳令人感动。

在《儒藏》之前,卷帙浩繁的典籍不但寄托着很多文化人的梦想与期待,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那也是一座座被崇敬与向往的圣殿,一直到现在,能够翻阅古代典籍,能够收藏部分印刷出版的典籍,都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一家书店,一个书房,若是有几排大部头的典籍在列,总能给人带来安稳、厚重的印象。在这种瑰丽的典籍想象当中,也藏有一些令人感伤的情绪,比如《四库全书》中国仅存“三部半”,《永乐大典》原有22937卷,现仅存800余卷。自然灾害与战争,是这些典籍被残酷吞噬的主要原因,它们若是能够完整保留至今该有多好——这是无数人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

《儒藏》项目的推出,有着诸多重大的意义。从历史与收藏、阅读等层面看,它是一个弥补诸多典籍传世遗憾的非凡举措;在内容上,2023年启动的《儒藏》编纂,着重收录儒家经典及其历代注解、历代儒家学者集中阐发儒家思想的古籍,适当收录突出反映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典

籍,能够反映儒家思想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以及古代自然科技领域持久广泛的影响;在规模上,全本《儒藏》收书3000余种,总字数约10亿,更是刷新了历代儒家典籍编纂的品种与字数纪录。《儒藏》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它的存在并非尝试要取代《四库全书》等典籍,而是独立于浩渺的文化时空当中。

《儒藏》采取“整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方式,对版本进行严选,对内容进行审慎校点。为典籍加标点,方便了读者的阅读、理解与使用,但也容易出差错。不少学者表示,加标点非常考验编纂者的胆量与能力。不过在技术向善的潮流下,版式识别、自动标点、结构整理、校勘等涉及古籍整理的全流程整理功能,已经在“识典古籍”系统得到了全部实现。《儒藏》整理者将相关文献的影像上传平台后,人工智能会进行初步标点,专业人员再进行校对及作出更有深度的学术判断,大大减少专家在基础性工作上投入的精力,

不仅加快了进度,也提高了精准度。

受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能够收藏一套像《儒藏》这样的纸质出版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藏家与藏书”理想的双向奔赴模式。但在典籍数字化成熟的出版模式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倾向于拥有一套数字版的典籍。据报道,《儒藏》整理工作完成后相关成果会在“识典古籍”上线,对公众永久开放。这标志着人人可拥有一套完整的《儒藏》已经并非一个奢侈想法。

班固在《汉书·晁错传》中首次说出了“以大化小”成语。《儒藏》的编纂出版以及数字化呈现,能见其大,也可见其小。对于读者来说,可以随时在线阅读、检索、复制使用《儒藏》,就是这一大部头经典进入每个家庭、送到每个人手中的日常事件,而恰恰是这样小小的日常举动,会对典籍使用产生波澜壮阔的化学反应。典籍与公众的精神融合,会使那些曾经照耀一个时代的著作,在当下继续散发永恒的光辉。